

## 第一章 首次莅京

1894 年 6、7 月间，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抵达天津，上书李鸿章陈述“富国强兵之道”。但未被采纳。于是孙中山第一次来到北京，亲自调查了解“清廷之虚实”。他目睹清政府贪污腐败，军备废弛，因而认识到“实现任何改进是完全不可能的”。此后，孙中山决心建立革命组织，发动武装起义，推翻清朝政府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。孙中山首次莅京，促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。

**1894 年（清光绪二十年 甲子）**

1 月至 2 月（癸巳年十二月末至甲午年正月初）孙中山在翠亨村起草《上李鸿章书》。

按：陈少白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云：

“有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广州，忽然药房里有信来，说：‘孙先生失踪了，药房中开销很难，收入不敷，只剩十几块钱了’。我接到信，就到广州去，替他维持店务。等了多天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心里非常焦急。到十六那天，他忽然跑来了，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，他见了我就说：‘对不起！对不起’我问他：‘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’他说：‘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’。就打开他手里的一卷纸给我，我拿起来一看，纸里

面乃是一篇《上李鸿章书》。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。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，我就随便稍为修改一下。以后，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，就到上海去，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，我没有办法，就让他去，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，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”<sup>①</sup>。

又，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云：

“癸巳年十二月，孙总理因广州东西药局营业失败，遂回翠亨乡与家人团聚十余日，始赴香港。及晤陈少白，乃出其在乡所草上直隶（总督）李鸿章书稿，与少白斟酌字句，谓吾辈革命有二途径：一为中央革命；一为地方革命。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，则借此进身，可以实行中央革命，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，少白亦以为然。”<sup>②</sup>

春夏间 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抵沪，分访王韬、郑观应等人，寻找上书李鸿章之门径。

按：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云：

“甲午春 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”；既抵沪 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，借港友函介，分访王韬、郑观应诸人”。“总理出示上李鸿章稿，韬深为赞许，仅代修订数语，并为函介于直督幕友罗丰禄、徐秋畦等”。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、宋跃如二人。廷威为水师将弁，由观应介绍相识”；跃如字嘉树，粤之琼州人，

陈少白：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，载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辛亥革命》第一册，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。

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，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转录自陈锡祺主编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第一卷（1894年）1991年8月中华书局版，下同。

为耶教传道士”<sup>①</sup>。

又，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第一卷（1894年春夏间）载：

“先生在穗曾请魏恒致书盛宙怀，托盛宙怀向其堂兄盛宣怀推荐，郑观应亦致函盛宣怀予以推荐。

魏恒曾任澳门海防同知。魏致盛宙怀函云：‘兹愚者：香山县医士孙生名文号逸仙，人极纯谨，精熟欧洲掌故，政治、语言、文字均皆精通，并善中西医术，知者甚多，妒者亦复不少。现拟远游京师，然后仍作欧洲之游。久仰令兄观察公（按：即盛宣怀，时任津海关道）德望，欲求一见，知侄与世丈处，既有年谊世好，又蒙青照有素，特属函恳赏赐书于令兄观察公前先容’。

先生携魏函见盛宙怀，宙怀乃致函宣怀介绍：‘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，系广东香山县人，精熟欧洲医理，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函托求转吾哥俯赐吹植’。此信由先生带往天津，盛宣怀于6月26日（五月二十三日）收到。

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云：‘敝邑有孙逸仙者，少年英俊，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，留心西学，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，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，及游西北诸省履勘荒旷之区，招人开垦，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，其志不可谓不高，其说亦颇切近，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。兹欲北游津门，上书傅相，一白其胸中之素蕴，弟特以尺函为其介，俾叩谒台端’。并谓：‘孙逸仙医生拟自备斧资，先游泰西各国，学习农务，艺成而后返中国，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，并拟游历新疆、琼州、台湾，招人开垦，

转录自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第一卷（1894年）。

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，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，俾到外国向该国外交部发给游学执照，以利通行’<sup>①</sup>。

6月下旬（五月中下旬）孙中山与陆皓东由沪北上抵津，上书李鸿章，未被采纳。

按：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载：

“孙总理偕陆皓东于是年夏间行抵天津 寄寓法国租界佛满楼客栈，首持港沪友人介函访直督幕僚罗丰禄、徐秋畦等，道达上书意见。罗徐均允相机协助，旋将《上李鸿章书》投递”。

“鸿章借辞军务匆忙，拒绝延见，仅由罗丰禄代领得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纸，总理理由是深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”。

又，孙中山《上李鸿章书》（1894年6月）载于《万国公报》月刊第六十九、七十册连载之广东香山来稿《上李傅相书》。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九、十月上海出版。后又收入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，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。孙中山在上书中主张学习西方国家“富强之本”，使之“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利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”，并以此四事为“富国之大经，治国之大本也”。孙中山言：“以中国之人民财力，而能步武泰西，参行新法，其时不过二十年，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”。因李鸿章拒绝接见，孙中山的建议未被采纳。

原注：沈渭滨《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》，载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一辑；戈止羲《对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之补正》载《学术月刊》1982年第八期。又注云：“魏恒与盛宙怀致盛宣怀函月份不详，而收函为五月二十三日（6月26日）收郑函为五月（6月）魏函署二十八日，盛宙怀函署初十日，应是分别发于四月二十八日（6月1日）与五月初十日（6月13日）。盛宣怀曾否推荐，不详”。

又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》云：

“凭着戈登将军和其他外国人的帮助，李鸿章从太平天国的手中夺回了地盘。不久，他就被提升为总督。李曾经积累了怎样大量的财富是远近皆知的，就用不着在这里多提了。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，我在天津，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，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，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”。

7月（六月）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津抵京，第一次游历北京，亲自调查清廷之状况。

按：《孙中山全集》第六卷《建国方略·有志竟成》云：

“……及予卒业之后，悬壶于澳门、羊城两地以问世，而实则革命运动之开始也。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、联络防营，门径既通，端倪略备。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，以窥清廷之虚实；深入武汉，以观长江之形势”。

又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七卷《在香港大学的演说》（1923年2月19日）云：

“……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，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。我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，迨试诸省政府，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。最后至北京，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，更百倍于广州，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，愈高则愈龌龊”。

## 第二章 二次莅京

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孙中山为弭合南北分裂，巩固共和制度，应袁世凯的邀请，于 1912 年 8 月 24 日抵达北京，次日即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主持了国民党成立大会。在京期间，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十三次，同时授受袁世凯委托“筹划全国铁路全权”出席官方和社会各界欢迎会二十余次，接见中外记者九次，还接待了十三个国家的使节，并视察了京张铁路和清河织呢厂等。9 月 17 日孙中山离开北京。孙中山二次莅京，是他的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页。

1912 年（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）

4 月 11 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员持函至武汉，邀请孙中山北上，共商国是。

按：《中华民国史事纪要》（1912 年）载有袁世凯之邀请函，云：

“中山先生阁下：大业告成，高飞遐举，鸿冥天幕，蝉蜕尘埃，企慕私忱，匪言可喻。顷得沪上消息，知大驾将赴鄂中，与黎君宋卿倾谈国事，两贤相聚，天炳德星。世凯羁滞幽燕，不获饫闻政论，伊人秋水，寤寐交萦，本拟欢迎旌节，示我周行，因前承电复先回粤一行。粤事棼如乱丝，非先生才望不足以转

危为安，世凯何敢以一人之私，辜粤中父老云霓之望？惟数月后，粤事大定，务请屈临指教，俾纾輶饥。兹遣范君静生、张君真吾两员莅鄂，上候起居，并呈小影，一如世凯躬陪盛宴，亲挹雄谈，临颖神驰，无任延跂，惟为自重不宣”。

旋又函云：“逸仙先生鉴 顷上寸缄 交由唐君在礼、范君源濂赍呈，并面致区区。兹复加派张君大昕、王君赓偕同前往，所有鄙意，统囑由四君代达一切，幸垂教焉。于此，再问起居。袁世凯再叩”<sup>①</sup>。

4月12日 孙中山复电袁世凯，因急于返粤，缓日北行。

按：《孙中山集外集·文电》（1912年4月12日）载有此电文，云：

“急于返粤，仍乘联鲸舰取道沪上，缓日北行”<sup>②</sup>。

又，上海《民立报》1912年4月14日载：

“袁世凯特派迎请孙中山北上之代表范源濂、张大昕抵达武昌后，是日，孙中山即予接见。今再正式复电袁世凯道谢，并言急于返粤，仍乘联鲸舰取道沪上，缓日北行”。

5月16日 袁世凯电请孙中山迅速北上入京。

按：《江西民报》1912年5月17日载：

“上海5月16日电：……袁总统电粤，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入京，磋商要政，并令公子克定来沪迎迓”。

《中华民国史事纪要》（1912年）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版。

《孙中山集外集》，陈旭麓、郝盛潮主编，王耿雄等编，199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，下同。其原注云：“据上海《民立报》1912年2月14日，《北京电报》”。

5月中旬 孙中山复电袁世凯，告之目前实难北上。

按：《孙中山集外集·文电》（1912年5月中旬）载有《复袁世凯电》云：

“粤省大局渐次平静，各处界限尚未甚融洽，须往各属一行，目前实难北上。并允于借款事极力调停。”<sup>①</sup>

5月29日 孙中山致电黄兴，约同赴京。

按：《孙中山集外集·文电》（1912年5月29日）载有《致黄兴电》云：

“约同赴京，以调和党派，提倡国民捐为目的。”<sup>②</sup>

6月初旬 孙中山表示日内即拟北上入京。

按：《江西民报》1912年6月2日载：

“广东六月一日电：……孙中山先生月初北上，此行政见：（一）婉商各公使早换国书；（二）代华侨求参政权；（三）调停借款；（四）劝募华侨国民捐；（五）提倡募集国内公债；（六）调停党派；（七）解散军队；（八）发行国债票”。

又上海《申报》1912年6月4日载：

“孙中山前日由粤来电言，六月初旬即行北上。闻其来京原因：（一）调停党派；（二）拟来北方提倡民生主义；（三）因满蒙一带对于共和，恐不能确实承认，拟遍游一次，以侦察北方之真情；（四）因外债累起波折，拟竭力提倡国民捐，将粤东设箱街市之办法，行之直、豫、鲁、晋一带，以期收效神速；（五）华侨要求代议权，中山极为赞成，特来代为说明理由，以

其原注云：“据上海《天铎报》1912年5月21日”。

原注云：“据《江西民报》1912年5月30日，《广州5月29日电》”。

求参议员之同意；（六）因南洋华侨对于国民捐极为热心，特来与总理商定鼓励办法”<sup>①</sup>

8月2日 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 告之不日即同北上入京。

按：《孙中山集外集·文电》（1912年8月2日）有《致袁世凯电》<sup>②</sup>，云：

“国基创新，缔造维艰。我公雄略伟划，夙深景仰。久欲一亲馨咳，以慰私衷，拟缓数日，即同北上。承过爱派员及轮，愧不敢当，谨此布谢。孙文、黄兴叩。冬”<sup>③</sup>。

8月18日 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请，离沪启程赴京。

按：上海《民权报》1912年8月19日载：

“孙中山、黄克强两先生因北京政府遣代表程克、张芳二君欢迎，已志前报。两公欣然拟联袂北上，与袁世凯面商国事，并以调和南北意见及党见自任。遂定于十七日乘招商局‘安平’轮起程，因事改至十八日午后启程。

是日午前，各省在沪人士，因张振武等未经审判，由总统据黎元洪电，直接飭步军统领衙门逮捕枪毙一案，就商孙、黄二公。众谓：观北方此等现象，一若并非真共和，殊形危险，劝二公勿往。万一孙公不留，则请黄公暂止。黄公欲与孙公偕。旋接汴、皖、闽、粤等省劝二公勿往电报，并见步军统领所宣布

按：以上两条，均转录自王耿雄编《孙中山史事详录》（1911—1913），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，下同。其按云：“此件《孙中山全集》未载”。

原注云：“此系与黄兴联名致袁世凯电”。

又注云：“据《申报》1912年8月13日《欢迎孙中山、黄兴北上》”。

张振武等罪状，影响模糊，殊耐研究。黄公尚犹豫，孙公亦劝其暂止，遂默然，仆人乘机即将行李迁回。

孙公于午后由同孚路黄公寓所起程登‘安平’轮船，中外人士欢送者络绎不绝。孙公在舱接见与西人某君谈话至一小时之久，欢送孙公诸人登船，尚有劝孙公勿往者。大致谓：‘公世界伟人，历经艰险，岂怯于民国成立之后。惟此行以有益、无益为断。观北方情形，似即行亦无大裨益’。孙公谓：‘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，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，我则以为可靠，必欲一试吾目光’。

当众劝阻时，某女士请孙公入船室谓之曰：‘公国民代表，共和坚城，必欲投身虎穴，某誓死反对’。因出武器自拟，孙公亟止之，并慰留再三，始快快登岸。北京代表张芳，当孙公登船后，犹奔走黄寓，强其偕往，黄公不允。则又登船掖孙公入室，长跪其前，求孙公同意强黄公。否则，诸公杀我，并作势欲出门投江。孙公笑曰：‘有何大事，某一不能了之，必克强与偕？且我亦主张克强不往’。众见张某情形，大为疑异。某君欲唤警捕保护其身命，有人以颜面攸关遂止。

此次从孙公从行者，有魏宸组、居觉生（正）、王君复等十余人。孙公眷属亦随同一行。四点二十分，‘安平’轮启程，送行者立微风细雨中脱帽扬巾，孙公及偕行人立船顶答礼。‘海琛’巡洋舰知孙公将行，先时驶赴三夹水暂泊守候，‘安平’出口 随同护送”。

又，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第二卷（1912年8月18日）云：  
“离沪启程赴北京。

自先生解职后，袁世凯一再邀先生赴北京共商国是。 6、7

月间，袁世凯因内阁问题与同盟会冲突，急欲借先生及黄兴之力调和，乃于 8 月派程克、张芳赴沪敦促先生及黄兴北行。本日午前，各省在沪人士以张振武、方维被违法杀害，众谓观北方此等现象，一若并非真心共和，殊形危险，劝先生及黄兴勿北上，汴、皖、闽、粤等省亦来电劝阻。先生乃劝黄兴暂留，本人则于午后登‘安平’轮船如期北行。启航前尚有劝先生勿往者。先生谓：‘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，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，我则以为可靠，必欲一试吾目光’。随先生北行者有居正、魏宸组等十余人及卢夫人。四时二十分，‘安平’轮启程，由‘海琛’舰随同护送’<sup>①</sup>。

又上海《民权报》1912 年 8 月 23 日载：

“孙中山北上，……未行之时，手编《中华民国共和真理》一书，分类二十五部，内中安置满族，抚慰蒙、藏人士，尤为详晰。此次北行，将此篇携之而往，意欲与袁世凯商榷一切，如果合意，拟赴外蒙古一行’<sup>②</sup>。

△ 孙中山与从者谈话。

按：《孙中山集外集·谈话》载有《与从者的谈话》（1912 年 8 月 18 日），云：

“从者说道：不要去，他（指袁世凯）请你去，要用对待张将军的手段杀害你的。

中山说道：去是我的责任。因张振武的无故被杀，内战可以因此而起。我们必须保持中华民国的统一。倘使我不到北京

① 原注云：“《孙中山北上报道》，《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》上册”。

转录自《孙中山史事详录》（1911—1913）。

去，国民都要以为我惧怕袁氏。倘使我去，国民都要想，我是保护他们利益的”<sup>①</sup>。

8月20日至8月21日 孙中山途经烟台 暂留期间 受到各界热烈欢迎。

按：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第二卷 1912年8月20日至8月21日 载：

“途经烟台暂留。

20日晚，先生所乘‘安平’轮抵烟台。21日晨入港。先生接受各界欢迎。中午，出席同盟会分会及社会党在烟台群仙茶园之欢迎会，演说中谈及国民党之宗旨。后又出席旅烟广帮绅商之欢迎会。五时，至张裕公司茗谈一小时，并索阅烟台前议筑挡浪坝及烟滩铁路招股章程。在商界欢迎会中演说，谓：‘为今之计 欲商业兴旺 必从制造业下手’<sup>③</sup>。

又上海《申报》1912年8月27日载：

“孙中山先生于本月20日晚抵烟台，因风浪太大，暂在石岛避风。翌晨八钟始行抵港，惟时陆军部曲参议同丰，各营军队，以及关外军队、各区区官、各区巡警、商务会董事等均至码头迎迓。孙先生登岸时，各员均行一鞠躬礼，军士行举枪礼毕，遂由曲参议、连司令、商司令同至饭店宴饮，道旁观者塞途，颇极一时之盛”。

据〔美〕林百克著、徐植仁译：《孙逸仙传记》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2月版，下同。

原注云：“《申报》1912年8月27日”。

又注云：“《国父全集》第二册第243页”。

△ 孙中山出席烟台各界欢迎会，并发表演说。

按：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二卷有《在烟台各界欢迎会的演说》<sup>①</sup>（1912年8月21日），云：

“今年，中华民国之第一年，比去年大有分别。去年今日尚在专制之下，今日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人人都平等自由。今日四万万人民合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民族为自由民，真是莫大荣幸。但第一年不过将专制推倒，政府须待再造，人人须负义务，令中华民国造成庄严之民国，始足称幸”<sup>②</sup>。

又，附：同题异文云：

“各界欢迎，无任感激。我中华民国之今日比去年今日，则大不同。去年今日，处专制政府之下，人人都受苦痛。今年则为中华民国之人民，都享有自由幸福。但中华民国缔造伊始，百步维艰，我中国人民皆有应尽之义务。兄弟此次至京，关于建设政见，当一一商之于政府，见诸实行。所有一切政见，谨烦魏先生代表略述”<sup>③</sup>。

△ 孙中山出席烟台同盟会暨社会党欢迎大会，并发表演说。

按：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二卷有《在烟台社会党、同盟会欢迎

原注云：“据《太平洋报》8月22日报道孙中山‘于20日抵烟台，翌晨入港’。孙中山在烟台停留一日，即经塘沽、天津，于24日至北京，此演说当在二十一日。时间是在是日上午。所录是演说的大意”。

又注云：“据上海《太平洋报》1912年8月28日”。

其原注云：“据《国父全集》第二册（转录《中华民报》1912年8月27日）”。

会的演说》<sup>①</sup>（1912 年 8 月 21 日），云：

“此次光复，由于人心趋向共和，同盟会不过任发难之责而已。但国中政党，只当有进步、保守二派。此次同盟会与各党合并，即欲使国中只存二党，以便政界竞争”<sup>②</sup>。

又，上海《申报》1912 年 8 月 27 日载：

“是日午前同盟分会暨社会党分部，在群仙茶园开欢迎大会，孙先生于十二钟莅会，各处遍插小旗，上书‘光复大汉’及‘欢迎同胞’等字样，复悬五色国旗，颇觉壮观，各界人士到会者约数百名，首由同盟分会会员高景钦宣读欢迎祝词如下：‘中华民国元年 8 月 21 日，我前大总统孙先生光临烟台，同人等谨集合各界同志开欢迎大会以表微忱’。且致词曰：‘力建共和，手创民国，四万万人咸食盛德，枉驾莅烟，海山生色，敬祝先生前途万岁’。宣读毕，会场人员均起立向孙先生脱帽行三鞠躬礼。嗣同盟分会会员左君请孙公演说大意云：‘现在革命成功，文明日见进步，亦系革命之力。北京同盟会本部归并五党，宗旨相同，遂联络合并改组为国民党，以资进行政策’。并谓‘今日经烟，甚行匆忙，不过略为布告大意’云云。时届一句钟，到会人员均起立大呼孙先生万岁三声，民国万岁三声，遂振铃闭会”。

△ 孙中山出席烟台商会欢迎会，并发表演说。

按：是日下午，烟台商会假西南山盍斯花园欢迎孙中山先生。孙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。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二卷有《在烟台

原注云：“演说时间在下午。此件是演说的大意”。

又注云：“据上海《太平洋报》1912 年 8 月 28 日”。

商会的演说》（1912 年 8 月 21 日），云：

“中国商业失败，不止烟台一埠，凡属通商口岸，利权外溢，到处皆然。为今之计，欲商业兴旺，必从制造业下手，如本埠张裕公司，设一大造酒场，制造葡萄酒，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，将来必可获利，又如玻璃公司亦然。张君以一人之力，而能成此伟业，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。如山东草弁为出产一大宗，中国既改文明装束，则草帽之需要不知若干。烟台商人如能将草弁自制成草帽，则将来获利当无算。不独草帽为然，其他如丝、如棉花，皆生货输入，熟货输出，若能一一制造出成各种应用之布疋，其获利当不出亿计。总之，中国今日农工商各种实业，宜互相提携，力求进步。不但烟台为北洋之一大繁盛商埠，即富强之基础，亦是乎在。此兄弟所最希望者”①。

△ 孙中山参观张裕公司，题赠“品重醴泉”四字。

按：佚名编《总理遗墨》（影印原件）载：

“是日下午五时，孙先生复莅张裕公司参观，茗谈一小时，对该公司的酿酒业给予赞扬，并大力鼓励，题赠‘品重醴泉’四字”②。

8 月 22 日 孙中山离烟台，仍乘‘安平’轮赴天津。

按：上海《民立报》1912 年 8 月 22 日载有孙中山《致宋遁初书》。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二卷有《致宋教仁函》③（1912 年 8 月

原注云：“据《国父全集》第二册（转录《中华民报》1912 年 8 月 27 日）”。

转录自《孙中山史事详录》（1911—1913）。

原注云：“此件所标时间系《民立报》发表日期，前后删略去该报‘前’‘下略’原文。”

22 日），兹录如下，以供参考：

“民国大局，此时无论何人执政，皆不能大有设施。盖内力日竭，外患日逼，断非一时所能解决。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，必至日弄日纷，每况愈下而已。必先从根本下手，发展物力，使民生充裕，国势不摇，而政治乃能活动。弟刻欲舍政事，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，于十年之中，筑二十万里之线，纵横于五大部之间。计划已将就绪，而资本一途，亦有成说。（弟所拟之借资办法，较之往日借资筑路条件优胜甚多：一、事权不落外人之手；二、国家不负债务；三、到期收路，不出赎资。）今所待者，只要参议院之赞同、政府之特许即可从事。然多数同人不免以此举规模过于宏大而起惊疑者，故现尚未发表。拟先来北京一行以觐人心之趋向’<sup>①</sup>。

8 月 23 日 孙中山抵塘沽，与某报记者谈话。

按 孙中山乘“安平”轮于 23 日午时到塘沽，与某报记者谈话，云：

“记者问：先生在津可稍住否？

先生曰：然。

记者问：先生北上之用意。

先生曰：予此次北来之意，不外调和南北感情，巩固民国基础。至于外交、财政、内政各事，若袁总统有问，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，以期有所裨补。如袁不问及，余亦不便过问。

记者又问：先生之铁道政策如何？

先生云：余之来意，尤在振兴实业，但欲振兴实业，必自

原注云：“据上海《民立报》1912 年 8 月 22 日《致宋遁初书》<sup>②</sup>。

修造铁道入手。余意全国铁道当有全国大计划，但此计划须俟政府之政策决定及得参议院之同意，始能决定。余意如国民全体不尽赞同，得数省同意，亦可就数省开办。

记者又问：资本金之筹划政策。

先生云：如国民有力担任，自应由国民兴办；如国民无力担任，只好大借外债兴办。但借债必须有最良之条件，不至如前清时之损失权利。总之，铁道政策为中国近日最要问题，无论政府、议院意见如何，余必尽力提倡此事”<sup>①</sup>。

△ 下午，孙中山抵天津，受到各界热烈欢迎。

按：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第二卷（1912年8月23日）云：

“下午六时抵天津，受各界欢迎。北京代表梁士诒、直隶都督张锡奎、同盟会代表张继等谒见。先生登岸后，各官长及各团体至后相随，由马队保卫至利顺德西饭店。约八时在该店宴会，张锡奎请各团体代表作陪”<sup>②</sup>。

又上海《民立报》1912年8月30日《孙中山抵津志盛》云：

“‘安平’轮于23日下午五时，始抵天津。都督府接烟台电，知孙先生即日到，当即派人至招商局码头收拾清洁，预备欢迎。警道派出警士甚多，各作护卫，并设有马车数乘。二时余，都督张金波、警道杨以德、交涉使王克敏、提学司蔡树阶、运司张弧、同盟会张继、孙少侯、王法勤、于邦澂、统一党纪

据上海《太平洋报》1912年8月28日。又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二卷有《在塘沽与某报记者的谈话》（1912年8月23日）内容与此相同。

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，其注云：“《民立报》1912年8月30日”。